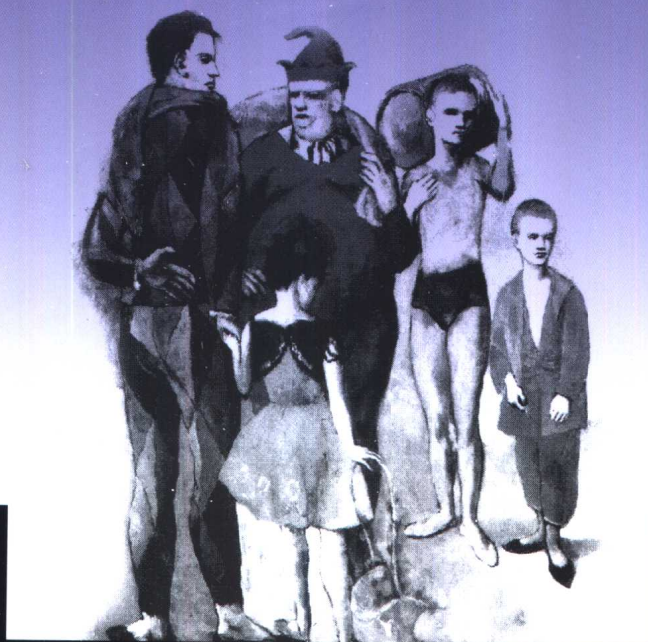




LUOYANWENCONG

孙
康
宜
著



把苦难收入行囊

Journey Through Hardship

往日的苦难就好像是旅途中一直携
带着的行囊一般，那是我不愿也不
能忘却的东西……我原以为从前幼
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
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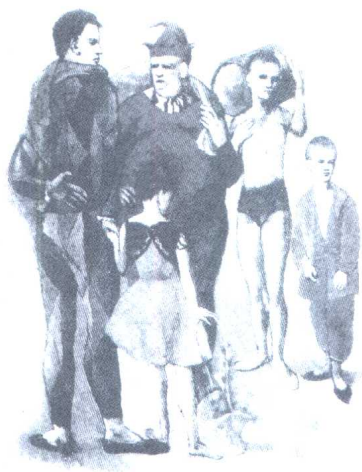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

裸眼
文丛
LUOYANWENCONG
策划：曹 晋

孙康宜著

把苦难收入行囊

Journey Through Hardship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苦难收入行囊 / 孙康宜 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12

ISBN 7-5426-1747-8

I. 把… II. 孙… III. 孙康宜—回忆录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5830 号

把苦难收入行囊

著 者/ 孙康宜

责任编辑/ 黄 韬

封面设计/ 王志伟

版式设计/ 鲁继德 王丽娜

监 制/ 林信忠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刷装订/ 上海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35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3.75

印 数/ 1—8100

ISBN7-5426-1747-8

G · 593 定价: 25.00 元

关于“裸眼文丛”

由上海三联书店精心筹备、着力推出的“裸眼文丛”，是一套开放型丛书（无题材限制、无部数限制），只要是反映时代、社会、人生、艺术等各色事象，且具有一定文化品位的作品，均在选择之列。丛书取名“裸眼”，是取“无遮无拦”的“裸”之意，即：力争选择那些剥离了文化偏见、思想偏见、宗教偏见——“光”着眼睛看世界的作品——当然，仅仅是“力争”，是一种努力；同时，另寓一意：直面世界，看那裸露的真相。

丛书的形式一如已经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几部，图文并茂，16开本，版式随题材变化而变化。

欢迎各方人士来信来稿。

编者

2002.11.8

自序

本书的书名是《把苦难收入行囊》，这是因为书中所描述的，基本上与我个人童年时代所遭受的苦难有关。对于一个旅居美国多年的人来说，我的人生仿佛是一段连续的旅程。同时，往日的苦难就好像是旅途中一直携带的行囊一般，那是我不愿也不能忘却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是一本有关“走出”白色恐怖的书。这本书所记录的人多是半个世纪以来，我自己家人和某些亲戚、师长、朋友们所经历的真实故事。本来在60年代后期（当我刚移民到美国时），就准备要写这书了，但这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专心于自己的事业，以至于把那个原来的写作计划给耽搁了。

但最近以来，我突然有一种恐惧——一种害怕会把过去遗忘的恐惧。过去的记忆有如长了蛀虫的善本书，再不保护处理就会被丢失了。因此我的好朋友黄进兴博士再三嘱咐我：“你若不赶快写下来，那段记忆就没有了！”同时，曹晋博士和上海三联书店的黄韬先生也给我同样的督促。此外，普林斯顿的陈淑平女士、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和哈佛大学的张凤女士都不断鼓励我，而我耶鲁的同事牟岭博士在电脑的操作方面也给了我许多实际的帮助。可以说，我之所以能下决心在忙碌的时间夹缝中偷取机会写作，并能及时完成此书，和以上诸位的不断催促有很大的关系。

写在这里的章节大多与白色恐怖有关，但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地，这是一本“感恩”的书——对于那些曾经给我们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难尽的。那些善良的人大多是被世人遗忘的一群，他们也一直承载着复杂的历史政治纠葛，因此我要特别把他们故事写出来。

这本书也叙述了我自己自我追寻和自我反省的过程。当我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回忆过去时，我发现我又学到了许多。

我原来以为从前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我感谢早期那段艰苦的人生历程，是它让我在成长中提前成熟，也让我在缺憾中找到了完整的自我。诗人席慕蓉曾经说过：

那时候你就会明白
生命中所有残缺的部分
原是一本完整的自传里
不可或缺的内容

（《残缺的内容》，1984年）

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要特别谢谢我父亲孙保罗先生所供给的宝贵材料。我也要感谢我的丈夫张钦次，是他多年来的热心和想象帮助我“走出”过去的阴影。

最后，我要把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孙陈玉真女士。没有她，就没有这本书，因为她是本书的主角。

2002年9月于耶鲁大学

目 录

Journey Through Hardship

自序 / 1

张我军、张光直和我们家 / 1

“二二八”的联想 / 13

六岁 / 18

雪中送炭恩难忘 / 28

探监途中 / 35

父亲的故事 / 40

母亲的固守 / 44

出狱 / 48

骨灰的救赎 / 55

在语言的夹缝中 / 64

大舅和鹿窟事件 / 75

虎口余生记 / 86

红豆的启示 / 100

两岸的受害者 / 121

务实的拓荒者 / 137

最后一张卡片 / 148

两个母亲编织的“女书” / 155

Moses, Charlotte 与我 / 163

女儿十六岁 / 170

作者成长年表和有关事件 / 185

自序

本书的书名是《把苦难收入行囊》，这是因为书中所描述的，基本上与我个人童年时代所遭受的苦难有关。对于一个旅居美国多年的人来说，我的人生仿佛是一段连续的旅程。同时，往日的苦难就好像是旅途中一直携带的行囊一般，那是我不愿也不能忘却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是一本有关“走出”白色恐怖的书。这本书所记录的大多是半个世纪以来，我自己家人和某些亲戚、师长、朋友们所经历的真实故事。本来在60年代后期（当我刚移民到美国时），就准备要写这书了，但这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专心于自己的事业，以至于把那个原来的写作计划给耽搁了。

但最近以来，我突然有一种恐惧——一种害怕会把过去遗忘的恐惧。过去的记忆有如长了蛀虫的善本书，再不保护处理就会被丢失了。因此我的好朋友黄进兴博士再三嘱咐我：“你若不赶快写下来，那段记忆就没有了！”同时，曹晋博士和上海三联书店的黄韬先生也给我同样的督促。此外，普林斯顿的陈淑平女士、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和哈佛大学的张凤女士都不断鼓励我，而我耶鲁的同事牟岭博士在电脑的操作方面也给了我许多实际的帮助。可以说，我之所以能下决心在忙碌的时间夹缝中偷取机会写作，并能及时完成此书，和以上诸位的不断催促有很大的关系。

写在这里的章节大多与白色恐怖有关，但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地，这是一本“感恩”的书——对于那些曾经给我们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难尽的。那些善良的人大多是被世人遗忘的一群，他们也一直承载着复杂的历史政治纠葛，因此我要特别把他们故事写出来。

这本书也叙述了我自己自我追寻和自我反省的过程。当我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回忆过去时，我发现我又学到了许多。

张我军、张光直 和我们家

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先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家的老熟人。

常听我父母说，当年（1946年春季）我们一家人如果不是张我军先生的帮忙，一定很难顺利地上海黄浦江登上轮船，越洋安抵台湾。据说当时的船票很难买到，要排很多天的队才能勉强拿到票。即使能买到票，由于所有的船舱都是人挤得满满的，我们一家大小是否能安全地上船还真成问题。特别是，要上船之前，人人还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爬上一个又高又窄的梯子，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海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抱着小孩上那梯子就更加危险了。但张我军先生却毫不犹豫地抱起我那个才三个月大的弟弟康成，奋勇走上了那个危险的阶梯。接着，我爸爸抱着我上去。最后，我妈妈也终于上了船。对于这件事，我父母一直记在心里。

其实和家人离开大陆的那年，我才刚满两岁。按理说，一个两岁的小孩不可能记清楚当时大家乘船渡过台湾海峡的惊险实况。但奇怪的是，那段渡海经验的某些片段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张伯伯在船上时时刻刻照顾我（我当时太小，还不知道他就是台湾的著名作家张我军先生），我记得他头上的头发梳得十分整齐，人长得并不很高，至少没有我爸高。另一个经常出现的镜头是：船上的甲板似乎到处都很破旧，连母亲盖着的棉被也沾上了不少铁锈。我看见母亲在甲板上不断晕船呕吐，父亲则整



1944年2月，
作者生于北京。

天忙着照顾她，还有那个仍在襁褓中的大弟康成。这时，张伯伯就和我在船上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还领着我和其他乘客说话。我还隐约地记得，抵达基隆港刚上岸时，张伯伯还买了一根冰棒给我吃。我看着那冰棒直冒气，以为那东西很热，一直想把它吹冷……。

1946年我们全家和张我军先生去台湾时，乘的大概就是这种轮船。当时很难买到船票。（此相片摄于1979年作者回大陆寻旧之旅。）

在记忆中，小时候我常想起船上的一幕，每当我回忆那位可亲的张伯伯时，还以为那人只是萍水相逢的乘客。直到许多年后，有一次母亲才告诉我：那位张我军先生早在北京时就是我们家的至亲好友了。据母亲说，1943年她和我爸结婚后，就一直住在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北新华街。当时父亲24岁，刚从早稻田大学的政经系毕业后不久，曾在北大当讲师，



后来离开北大，开始专心教英文。张我军教授一直在北大教日本明治文学。由于两人对于日本文学的共同兴趣，很快就成了忘年之交。（张我军先生较我父亲年长十七岁。）后来他们发现，两家人有极其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因此他们自然就更加频繁地来往起来了。原来，张我军先生来自台湾，他的妻子罗文淑是在北京长大的大陆人。而我父母的情况正与他们相映成趣：我父亲是天津人，在天津英租界长大，但自日本回国后长期住北京；而我母亲则是一个早年在日本留学的台湾人。在感情上，两对夫妇都是来自“异国”而一见钟情的好例子（当时台湾还被日本侵占，故曰“异国”）。为了他们的婚姻，双方又都经过长久的挣扎奋斗才终于如愿的。此外，他们的日语又都很流利，时常被错认为日本人。加上两家人都很迷外国电影，正巧我们家就在中央电影院（即现在的北京音乐厅）对面，所以每回张我军夫妇来看电影，就顺便先来我们家吃晚餐并聊天。当时他们那种神仙似的生活确实令人欣羡。



1943年爸妈在天津拍的结婚照。我父母的婚姻正与张我军先生的情况相映成趣。张我军先生是台湾人，他的妻子是大陆人，而我父亲是大陆人，我母亲却是台湾人。

然而，好景不常，1946年初北京人已渐渐感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据说北大也快要停发薪水了。

父亲每天早晨出去上班，时常看到沿街到处都是又穷又饿的乞丐，他总是把口袋里仅有的零钱全都给了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冬天的北京街头更是惨不忍睹，早晨常会看见冻死了的人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下，爸妈开始为来日的经济问题发愁。可以说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了。后来他们只得找张我军先生商量，大家终于决定要一块儿搬去台湾，希

刚到台湾时，
作者两岁（右），大
弟三个月（左）。



望能在海的另一边找到好的求生之路。他们想，以他们杰出的学历，至少能在台湾大学找个教书的工作吧！加上他们在台湾又都有亲戚，于是就更加充满信心了。因此，这就有了他们1946年春一同自黄浦江上船的台湾之旅。

从小我就把张我军先生当成了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对我来说，他简直是“勇敢之神”的替身。后来，母亲还告诉我一个动人的故事：据说孙中山刚去世后不久，张我军先生就写了一篇题为《孙中山先生吊词》的诗，是准备用在一个秘密的追悼会上的。当时台湾人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只敢暗暗地悼念孙中山，不敢公开流泪。这时，日本警察发现了这首悼诗，十分恼怒，立刻严禁台湾人朗读该诗。幸而这首诗并无具名，否则当时还很年轻的张我军先生一定会惨遭迫害。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一直到现在还时常讲给人听，所以我的许多朋友只要发现与张我军先生有关的生平轶事，都会立刻与我分享。例如，最近我的耶鲁同事 John Treat 教授在偶然的会里，找到了一个日本史料，颇富启发性。那条史料出自岩谷大四的《“非常时日本”文坛史》一书中。据岩谷先生所述，1942年年底在东京举行了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当与会的作家们刚抵东京火车站，他们就听说大家必须集体前往日本皇宫，以便向日本天皇致敬。当时，所有的韩国代表——包括著名的作家李光洙（香山光郎）——都非常高兴。惟独代表中国的张我军先生拒绝参加这个典礼；为了表示抗议，他立即转身，把背对着皇宫。（这里要说明一点：张我军虽是台湾人，

但他因长期居住北京，故那次会议中，他代表中国，并不代表台湾。台湾方面则由张文环等人代表。）当时岩谷大四先生正好在场，看见张我军先生的表现，很佩服他的骨气，所以多年后撰写那一段历史时，岩谷先生还念念不忘张我军，特别在书中记载此事。〔注〕

可惜张我军先生早已于1955年逝世。而张光直教授也已于去年过世，否则我一定会把岩谷书中的这段史料告诉他。

我是1974年年初识张光直先生的，地点是普林斯顿校园。记得，才第一次见面，我就忍不住把两家交往的旧事告诉了他，同时也顺便把1946年春那段难忘的船上经历给他描述了一番。他对那船上的故事特别感兴趣，这是因为这段往事正是他从来所不知道的，而我的描述正好可以补足他资料上的空白。原来，当时张我军先生带我们去台湾，他并没带他自己的家人一道上船，因为他打算独自一人先去台湾找事，等有了着落之后，才慢慢把妻子和孩子们从北京接到台湾。因此，当时正在北京上中学的张光直并没和我们一道在船上，否则他早就会与我认识了——虽然我当时才只是一个两岁大的女孩。（张光直和他的母亲一直到该年12月底才到台湾，他们是从天津上船的，一共坐了三个月的船才终于抵达基隆码头。）

近来我时常在想，我与张光直教授的生平境况有些像两条相近而平行的铁轨，尽管我们的家人曾经有过那般密切的交往，但由于各种时势的运转和政治的因素，我们从来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一直到许多年后各自都移民到了美国，都已在汉学界里做研究，这才开始互相认识。但这时才发现，那段无声无息的历史也暗暗地流逝了。

然而，在我们各自的心中，彼此都深切地体验到，那五十多年前乘船渡海的经验确是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捩点。首先，到了台湾之后不久，我父亲就受到亲戚朋友们的连累，于1950年1月底被冤枉成政治犯，坐牢十年。与此同时，张



张光直早年生活的回忆
及四六事件入狱记

番薯人的故事

张光直 著

这是1998年
张光直教授的大
作,此书有关1949
年张光直涉及“四
六事件”的详情。

我军先生在台湾“始终处在半失业的状态”(见《张我军文集》,页121),后来为了养家,只得在台北开一间茶叶店。也听说,张光直以一个建国中学学生的身份,因涉及所谓的“四六事件”而于1949年被捕。(有关此事的详情,直到最近读了张光直教授的回忆录《番薯人的故事》才完全清楚。)据我父亲说,1949年年底,在他被抓进监牢前的几个星期,曾有机会到

那茶叶店里去拜访张我军先生。他记得张先生那天满面愁容,言谈中也较平日来得安静得多。当时我父亲以为张我军的忧郁完全是出于一种“怀才不遇”的感伤——特别是,以张先生早年在北大教授日本文学的显赫地位,今日在台湾却如此潦倒,实在不怪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也没去推敲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后来过了许多年,我父亲出了监狱,再回头去想1950年元月初那次见面的情景,才突然悟到:原来那段时间正是张光直被关在台北监狱的时候,当时还传说有不少学生在狱中遭枪毙。可想而知,张我军当时一定为了儿子的事感到焦虑不堪了。

再过五年,张我军先生病逝,等我父亲于1960年出狱,当然也就见不到老朋友了。令人特别感伤的是,他们那一代的人似乎总是被迫在冷酷的政治面前永远保持沉默,所以即使和老朋友一起交谈,也不敢私下讨论自己儿子所遭遇的政治受难。关于这种“沉默”,我自己后来也学会了,以至于在我父亲坐牢的十年间——那就是,从我六岁到十六岁的十分漫长的成长期间——我一直不断地告诫自己,除非不得已,绝对不向人说有关父亲被捕的事。动乱时期的冷酷之一就是,连小小年纪的孩童也必须学习控制自己的舌头。但这样的“沉默”对我个人并非没有好处,它使我长期在沉默中培



耶鲁教务长 (Provost) 兼人类学家 Alison F. Richard 说，张光直是她的恩人。后来2000年的5月间，我在波士顿的医院里把 Alison F. Richard 的话转告病床上的张光直教授。光直为之感慨万千，一直落泪。（教务长的照片由耶鲁的 Michael Marsland 所摄。）

养观察周围的能力，使我较同龄的人来得早熟。问题是，对整个时代历史来说，许多重要而复杂的历史真相也都因为这种集体的“沉默”而随之被遗忘了。

记得1979年我在一次学术会议里再次碰见张光直教授。

当时我还特别和他讨论有关沉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我告诉他，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沉默”，我父亲终于得以离开台湾到了美国，而且已经开始在亚利桑那州教书了。可惜的是，我父亲已经习惯了“沉默”，从来不把他曾经在新店军人监狱和绿岛的十年经历透露给我们。可以说，只要是涉及台湾和中国大陆自50年代以来的政治问题，他全都闭口不言。幸而我母亲有时还会凭记忆给我透露一点儿信息，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但我知道，父亲的沉默是由于长期受到心灵的伤害所致，所以我从来不强迫他说什么。我对张光直教授说，可

惜张我军先生已经不在世了，否则我父亲可能会在老朋友的影响之下，再次恢复他年轻时代对当今现实的关切，或许也能学习从极端的沉默中走出来。一听到我提起他父亲的名字，张光直教授的一双大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他说：“请把令尊在亚利桑那州的地址给我，我回哈佛校园后，一定立刻寄给他一本我父亲的遗著……。”



1979年张光直把这本《张我军文集》寄到亚利桑那州给我父亲，我的父母将之视为至宝。

几天之后，我父亲果然收到了那本宝贵的书：《张我军文集》。那些文字是张光直教授从各处失散的报章杂志里收集而来的，该文集于1975年由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他的《序》里，张光直教授写道：“父亲逝世已快二十年了。其间我自己一直在国外为生活奔波。父亲的文稿和书籍都留在台北的家，也随着母亲和幼弟一次次的搬家而散失殆尽。所以这里所收的诗文篇幅虽少，却也费了很大的气力……读者如果看到我父亲历年的文章，值得重印而这里没有收入的，盼能告诉我……”这段序